當語言直覺遇上科學分析：語言學如何轉化為華語教學力？以漢語語言學理論為本探究華語教學實踐

「以漢語語言學理論為本探究華語教學實踐」演講現場（攝影：彭佳宣）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彭致翎】

當語言直覺需要轉化為可理解、可教學的知識時，語言學理論便成為連結研究與教學的重要橋梁。本院於 2026 年 9 月 18 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主任兼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洪嘉馡教授進行「以漢語語言學理論為本探究華語教學實踐」演講，從中文句子難度與動詞語意研究出發，說明如何運用語料分析、專家判斷與教學實驗，將語言學理論轉化為華語教學現場可運用的知識。

一句話的難易，並不只取決於詞彙是否常見或句型是否複雜，洪教授指出，母語者的使用頻率、華語學習者的偏誤情形、詞彙與語法難度，以及句子所需的背景知識，都可能影響理解。研究團隊以中文語法數位平臺及華語八千詞為基礎，整理中文句子的詞彙、句子結構與句子成分，並將母語者使用頻率與學習者偏誤率交叉分析，初步形成四種難度類型，再透過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EFR) 、漢語水平考試 (HSK) 及機器學習模型進行交叉檢驗，逐步建立中文語法點的難度對照架構。

洪教授以「樹都沒了，一下雨，泥土都沖到河裡去啦」為例，說明句子難度並非

單一指標可以決定。若改寫為「你們把樹都拔了，一旦下雨，泥土都被沖到河裡去啦」，事件參與者與因果關係變得更加清楚，語意理解可能較容易；然而，句中同時增加「把」、「一旦」與「被」等語法形式，語法結構反而更為複雜，這個例子顯示，語意清楚不必然代表語法簡單，也提醒教材編寫者與教師，在調整句子難度時，不能只刪減詞語或縮短句長，而需同時考量詞彙、語法與訊息結構之間的關係。

為檢驗句子難度指標，研究團隊進一步透過資深華語教師評估與小規模教學實驗進行驗證，教學實驗顯示，當語法形式（如「把」、「被」等）適度簡化後，學習者的理解表現隨之提升，顯示這套指標具備教學上的可操作性。洪教授同時提醒，句子難度並非固定不變，仍會受到學習者母語、程度、測驗狀態與教材熟悉度等因素影響，因此，難度指標不是為所有句子貼上絕對的難易標籤，而是提供教材編寫、分級與教學設計一套較可檢驗的參考依據。

除了句子難度，洪教授也從動詞語意切入，以動詞詞義模組屬性表徵理論 (MARVS) 為分析架構，說明看似簡單的動詞，其實包含不同的事件結構與參與角色，以「吃」、「玩」、「換」、「燒」為例，每個動詞不只是指稱一項動作，也隱含事件如何開始、持續或完成，以及動作者、受事者、工具與目標等角色限制，例如，「吃稀飯」與「喝稀飯」、「吃喜酒」與「喝喜酒」的差異，不能只用名詞所指的是固體或液體來解釋，而需進一步觀察動詞所表達的事件類型與語意搭配。

類似的分析架構，也能用來說明學習者常見的疑惑：「看好」、「坐好」、「包好」、「畫得好」四個形式雖然都帶有「好」字，語意卻分別指向動作完成、身體就定位、結果品質與程度評價，若不從動詞本身的事件結構切入，這類差異很容易被歸為「約定俗成」的用法，難以向學習者說明清楚的判斷依據。

洪教授強調，語言學理論不是直接搬入課堂、要求學習者記憶的知識，而是教師分析語言現象與設計教學活動的基礎。教師掌握語言內部規律後，才能選擇具代表性的例句、安排由淺入深的比較，引導學習者從觀察與歸納中理解語言。面對人工智慧逐漸進入教材編寫與課堂教學，理論知識也更加重要，AI 可以協助例句檢索、資料分類與初步分析，卻仍需由教師判斷輸出內容是否符合語意限制、語用情境與學習者程度，若缺乏對語言結構的掌握，再快速的工具也難以取代專業判斷。

從句子難度的量化研究，到動詞詞義的細緻分析，本場演講呈現了語言學理論

走向教學實踐的不同路徑，理論的價值不只在於描述語言，更在於協助教師看見表面形式背後的規律，理解學習者的困難，並據以設計更精確的教材與活動。當研究、教學與數位工具彼此連結，語言學便不再只是課堂外的抽象知識，而能轉化為教師分析語言、設計教學與協助學習者理解語言的重要基礎。